

# 美國經濟「雙重人格」背後的制度性困局

從「開放」走向「內向」：展望 2026 中選與 2028 大選的深層危機

一邊是 2025 年底亮眼的 4.4%GDP 年化增長率，一邊是民眾面對 20%至 25%累計通脹的切膚之痛。這種數據與體感的背離，正是理解當前美國「制度性轉向」的鑰匙。

目前的美國經濟呈現出一種令經濟學家迷惑的「雙重人格」。從宏觀賬面上看，美國正處於數十年未見的強勁增長期。隨著製造業回流政策的推進，全美各地的工業基地似乎正在復甦，工廠開工的轟鳴聲成了現任政府宣揚政績的底氣。然而，在這種亮眼的宏觀數據背後，卻隱藏著普通民眾真實生活中的切膚之痛——以及一個更為嚴峻的結構性警告。

## 一、經濟悖論：K 型分化與滯脹風險

**AI 支撐下的脆弱平衡：**瑞銀（UBS）在 2026 年 1 月的最新展望中發出警告：美國當前的經濟擴張高度依賴人工智能投資與財政刺激，這種「韌性」表面之下是極其脆弱的平衡。除了科技板塊一枝獨秀，大部分實體經濟實際上處於疲軟或收縮狀態。4.4%的 GDP 增長並非普惠性的繁榮，而是由單一驅動力苦苦支撐的結構性失衡。

**滯脹壓力浮現：**自 2021 年以來，美國經歷了近四十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，短短五年內累計物價漲幅已達 20%至 25%。瑞銀預計通脹將在 2026 年夏季觸頂，且關稅帶來的成本推動型通脹不僅侵蝕實際收入，更限制了美聯儲的政策空間——降息刺激經濟將加劇通脹，維持高利率則扼殺增長，貨幣政策陷入兩難。

RBC Economics 的分析進一步指出，雖然失業率看似維持在 4.4%，但僱傭和招聘指標已顯露疲態。美國正步入一種「輕度滯脹」的情境：GDP 增長低於 2%的典型趨勢，而通脹持續保持在 3%以上。這種「高物價+低增長」的組合，正是經濟學家最擔心的場景。

**購買力的隱形蒸發：**根據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（PIMCO）2026 年的報告，美國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已跌至近八十年來的最低谷。這意味著，即便經濟在增長，紅利也僅僅流向了擁有股票和房產的資產階級，而非靠工資吃飯的普通大眾。對於大多數依靠固定薪水生活的家庭來說，工資的漲幅已完全被物價的飆升所對沖。

**製造業回流的「人才錯位」：**製造業回流帶來了工廠，但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藍領繁榮。在高度自動化的今天，回流的製造業大多依託於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技術，真正渴求的是高技能工程師，而非教育程度較低的普通藍領工人。這種勞動力市場的錯位，使得「製造業回流」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數字上的繁榮，而非社會底層收入的普遍提升。

**財政脈衝的短期支撐：**2026年由於大規模退稅法案的實施，美國短期內可能迎來一波「財政輸血」。這解釋了為何經濟雖然結構脆弱但未立即崩盤。然而，這種財政刺激本質上是「借未來的錢救當下」，一旦財政脈衝消退，經濟的真實面貌將無處遁形。

## 二、政治極化：選民的「尊嚴補償」與優先錯位

共和黨的鐵桿支持者——那占比約40%的選民，主要分布在南部的鄉村和中西部的「鐵鏽地帶」。他們大多受教育程度有限，收入微薄，且大部分開支用於支付房租和基本生活費。在累計25%的通脹浪潮中，他們本應是現行政策最激烈的反對者，但現實卻恰恰相反，他們構成了堅不可摧的政治基本盤。

**民眾優先事項的錯位：**馬里斯特民調（Marist Poll）2025年底的數據顯示，57%的美國人認為「降低物價」應是政府的首要任務，遠高於「控制移民」（16%）。選民在面臨25%的累計通脹時感到的「生活成本壓力」已成為其最核心的政治考量。然而，現任政府的施政重心卻恰恰相反——將大量資源投入移民管控，而非物價平抑。這種優先順序的錯位，正在動搖共和黨此前穩固的支持率。

**犧牲經濟利益換取「政治尊嚴」：**對於鐵鏽地帶的選民而言，長期的全球化進程不僅帶走了他們的工廠，更稀釋了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和身份認同。因此，他們表現出一種「心理補償機制」：寧願忍受高物價帶來的經濟窘迫，也要支持旨在「關門、設障、排外」的政治議程。當他們感到自己作為「傳統美國人」的地位受到移民和全球化衝擊時，保護主義政策帶給他們的心理安慰，遠比錢包裡的幾百美元補貼來得重要。

經濟學家 Daniel J. Mitchell 將目前的政策定性為「自殺式保護主義」（Suicidal Protectionism）——這種政策雖然推高了生活成本，卻通過「身份政治」提供了心理補償。

**移民政策的連鎖反應：**目前政府推行的極端移民政策引發了廣泛爭議。包括奧巴馬、克林頓和拜登在內的三位前總統均對此發表了批評，這在歷史上極為罕見。這種「一刀切」的政策忽視了美國經濟的結構性依賴：服務業和基礎農業長期依賴非法或低層次移民。將這些人驅逐，不僅直接導致勞動力短缺，更迫使企業大幅提高工資成本，而這部分成本最終通過物價轉嫁給了普通消費者。

儘管兩黨各有40%的死忠粉，但決定美國未來的往往是那剩下的20%中間選民。這部分選民對「文化尊嚴」的狂熱度較低，而對「錢包開支」的敏感度極高。當57%的民眾將「降低物價」列為首要任務時，這種拉鋸戰的天平正在向民主黨傾斜。

## 三、制度困局：從人才吸納到人才排斥

二戰以後，美國之所以能長期占據世界科技與教育的巔峰，公認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其海納百川的人才吸納能力。然而，當下的政策導向正在拆除這座維持了近一個世紀的「人才長城」。

**高等教育的財政危機：**根據美國教育委員會（ACE）2025 年的實證研究，由於政策不確定性，國際學生入學的驟降已導致 **11 億美元的直接財政損失**，並危及 **2.3 萬個大學相關崗位**。2025-26 學年新國際生入學人數驟降了 17%，研究生減少 12%。

國際學生通常支付比本國學生高出兩到三倍的學費，是大學財政的直接支柱。這種衝擊會迅速蔓延至校園之外——在典型的大學城，國際學生的消費、住房和生活開支支撐了當地城鎮的繁榮。學生走了，這些城鎮的經濟活力也隨之枯竭。

**H1B 困局：**目前從國外直接招聘頂尖人才的 H1B 申請費用已大幅攀升至約 10 萬美元。2026 年最新的職場趨勢報告指出，這一高額收費的案件已進入聯邦上訴法院審理，極高的申請費用和簽證標準的頻繁波動，正迫使更多企業轉向跨境遠程工作和海外研發中心，增加企業在多司法管轄區的合規風險。

這一極高的經濟門檻，實質上堵死了絕大多數企業從全球獵取人才的路徑。大量受過頂尖訓練的留學生流向其他競爭國家或回流本國，美國正在完成一場史無前例的「人才逆向出口」。

**高科技產業的「離岸防禦」：**面對國內高技能人才不足的現狀，矽谷及大型跨國企業採取了無奈的對策：將研發中心直接設在海外，或利用遠程協作和人工智能技術，讓全球頂尖頭腦在不進入美國領土的情況下為美國公司服務。這帶來的長遠後果是——美國本土正面臨科技創新「空心化」的風險。

## 四、政治沙盤：2026-2028 的權力擺動

美國的政治運行始終遵循著一種微妙的「鐘擺效應」。基於目前的社會情緒與經濟指標，我們有理由對未來兩場關鍵選舉做出預判。

**2026 中期選舉：**歷史經驗表明，現任總統所屬政黨幾乎難以逃脫中期選舉的「魔咒」。馬里斯特民調顯示，民主黨在 2026 年國會投票意向中 **領先共和黨 14 個百分點（55%對 41%）**，這是三年來的最大優勢。主因正是選民對「高生活成本」的強烈不滿。

從目前的局勢看，民主黨有較大可能奪回眾議院，甚至在參議院也實現反超。一旦失去國會多數席位，現任政府的一系列計劃——從關稅政策到體制改革——都將面臨預算阻礙與司法審查。這意味著美國可能在 2026 年進入一個行政效率較低的「跛腳政府」時期。

**2028 大選：萬斯與紐森的正面對決：**2026 年 1 月的最新民調顯示，副總統萬斯（JD Vance）與加州州長紐森（Gavin Newsom）分別在共和黨與民主黨內保持領先。

萬斯在共和黨鐵桿選民中擁有高達 85%的支持率，是「美國優先」理念最忠實的繼承者。然而，他的政治前途與未來三年的經濟成績單高度綁定。如果通脹得不到遏制，或者「製造業回流」最終無法惠及普通工薪階層，萬斯作為政策的聯合執行者，將難以擺脫連帶責任。

紐森代表了民主黨的精英底色，他在中老年高知階層中影響力深厚。紐森已明確通過「重新劃分選區」等手段來對抗保守派，並公開抨擊現任政府像「霸王龍」一樣具有侵略性，以此建立強硬的領導者形象。紐森潛在的搭檔是亞歷山德里亞·奧卡西奧-科爾特斯，一位三十多歲、風格親民的年輕領導者，以其「廚房式敘事」著稱——擅長將複雜的經濟問題通過通俗語言解釋給大眾。如果紐森的「治理經驗」能與這位年輕人的「草根號召力」結合，將對萬斯的單一選民基礎構成挑戰。

2028 年的勝負手最終將回歸到最質樸的問題：選民的生活是否改善了？

## 五、亞洲視角：美國轉向對新加坡與東南亞的制度性衝擊

美國從「開放領航者」向「內向守門人」的轉身，對以新加坡為核心的東南亞（ASEAN）經濟圈而言，絕非一場遠方的觀火，而是關乎生存模式的制度性衝擊。

**供應鏈的「再平衡」壓力：**2025 年以來，美國頻繁動用對等關稅（Reciprocal Tariffs）作為常態化政策工具，這使得新加坡這類高度依賴貿易的經濟體首當其衝，其高達 8% GDP 的對美出口正暴露在不確定的關稅波動中。隨著美國強推製造業回流與「成功懲罰」機制——即對出口增長過快的地區加徵關稅——原本受益於「中國+1」策略的越南、馬來西亞等國正被迫面臨成本上升與合規風險的雙重擠壓。對於致力於成為區域供應鏈樞紐的新加坡而言，這既是挑戰也是轉機。

**人才與資金的環流風險：**美國對高科技人才（如 H1B 政策）的收緊和製造業回流政策，正試圖將全球人才「鎖死」在美國境內，或迫使研發中心向美國本土靠攏。這對新加坡吸引全球頂級科技人才、構建 AI 創新高地構成了直接競爭。美國移民政策的收緊與高額 H1B 費用，實質上是在全球人才市場設置「行政高牆」，這將干擾新加坡與矽谷之間的人才環流，並迫使區域內的跨國研發中心進行被動的離岸重組。

**「規則對抗」取代「自由貿易」：**美國放棄多邊貿易體系（WTO 框架），轉向選擇性的雙邊談判。這使得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型開放經濟體，被迫在不對等的博弈中尋求生存，其傳統的「不選邊站」策略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擠壓。星展銀行（DBS）首席經濟學家 Taimur Baig 指出，2026 年美國已成為「全球下行風險的震央」，新加坡副總理顏金勇領導的經濟應對小組（SERT）正密切關注這一變局。

在這種「規則對抗」取代「自由貿易」的新常態下，新加坡作為全球「信任支點」的角色正遭受挑戰。當美國選擇關注「牆」的建設而非「路」的鋪設，亞洲經濟體必須在破碎的全球化版圖中，重新尋找新的韌性來源與生存空間。

## 六、總結：「美國例外論」的審視與帝國週期的歷史拷問

縱觀歷史，沒有任何一個帝國的繁榮能夠逃脫週期律的演進。在經歷過二戰後近百年的全球領導地位後，美國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。美國當下的危機並非簡單的政策失誤，而是整個經濟與政治體系發生的底層邏輯漂移：它正從一個「開放、自信、擁抱挑戰」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，轉變為一個「封閉、防禦、戰略性退縮」的內向型政體。

**「美國例外論」的審視：** EFG International 在 2026 年的觀察指出，「美國例外論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審視。隨著地緣政治演變不可預測，許多選民對自身選擇感到不滿，這種「制度性不安」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心態。當一個國家的公民開始懷疑其制度的優越性時，信心的流失往往比經濟的衰退更為深遠。

**體系性的轉向：** 一個處於上升期的文明，往往表現出極強的人才吸納力和制度包容性。而現在的美國，通過增加關稅、退出國際組織、收緊移民，正在完成一場深度的「閉關鎖國」。這種自我圍堵的邏輯背後，是信心的缺失。當一個國家開始恐懼競爭，並試圖通過行政壁壘來保護其日漸老舊的產業時，它實際上已經從巔峰開始了下行。

前財長薩默斯（Larry Summers）曾指出，美國目前的通脹並非簡單的成本推動，而是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衡」與「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」共同作用的結果。他認為，這種通脹具有「內生性」，不是關稅下調就能輕易解決的。這印證了一個更深層的判斷：美國的問題不在於某項具體政策的得失，而在於整個發展模式的轉型困境。

**AI 獨木難支：** 目前美國經濟的「繁榮」本質上是靠人工智能單一驅動力苦苦支撐的脆弱平衡。瑞銀的分析警告，一旦 AI 投資熱潮動搖，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概率將顯著上升。這種「單腿走路」的增長模式，與二戰後美國依靠製造業、金融業、科技業多輪驅動的健全擴張形成了對比。

**社會運行的微觀觀察：** 這種宏觀的變化，在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也有所體現。結合筆者近二十年來在美國的親身觀察，兩個生活縮影值得一提。

**大學系統的變化：** 回想二十多年前在美國攻讀 MBA 時，學術界的嚴謹與教授的負責令人印象深刻。而今，這種精神似乎正在被一種「混日子」的平庸文化所取代。從管理層的推諉到部分教學人員專業水平的停滯，整個大學系統在失去國際競爭力的同時，也在失去其作為社會進步引擎的活力。

**服務業的管理狀態：** 麥當勞作為美國商業標準的象徵，其目前的管理現狀值得關注。在筆者經常光顧的店面，少裝漏裝、效率較低、管理混亂已成常態。這種全球第一大連鎖店表現出的狀態，反映了美國基層勞動力素質的變化與組織協作能力的挑戰。

**歷史的拷問：** 美國的問題，在於其試圖用「封閉」來解決「開放」帶來的副作用，結果卻可能引發更嚴重的體系性失靈。高通脹、人才流失、管理挑戰，這些都是體系轉型的代價。雖然這種變化並非斷崖式的，但其從巔峰轉身的姿態已然清晰。

歷史的規律告訴我們，當一個帝國開始關注「牆」的建設而非「路」的鋪設時，其領導地位的動搖便已開始。對於全球觀察者而言，我們需要審視的是：一個不再開放、不再引領創新的美國，是否還能在未來幾年中維持其全球第一的地位？對於亞洲經濟體而言，如何在這種變局中尋找新的定位與機遇，或許是更為緊迫的課題。

### 【作者簡介】

殷彤，管理學博士，洞見橋商業諮詢有限公司（InsightBridge Business Consulting）創始人。在獲得奧本大學博士學位之前，曾在多家企業擔任高管逾二十年。研究聚焦於組織文化、領導力選拔，以及機構為何系統性地無法培養危機韌性領導者。